

列斐伏尔“革命浪漫主义”思想探析*

阎 嘉

[摘 要] 列斐伏尔于1957年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与他所关注的20世纪美学问题有关,同时也是其战后新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哲学”批判的一部分。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出发,借助辩证法揭示新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断裂,赋予浪漫主义改造现实、实现未来可能性的革命性内涵。列斐伏尔提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一种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美学模式。它一方面从总体上反思以往的革命形式,另一方面整合并吸收传统浪漫主义方法,通过改造日常生活达到消除主体异化的目的,实现对新资本主义社会生存机制的批判。立足于浪漫主义传统,着眼于可能性的辩证法,批判新资本主义的弊端,构成了理解“革命浪漫主义”概念的三个基本层面。

[关键词] 列斐伏尔 革命浪漫主义 马克思主义美学 可能性的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B565.59

“革命浪漫主义”这一概念出自列斐伏尔(H. Lefebvre)^①于1957年发表的论文《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②。(参见Lefebvre, 1957)该文表明,列斐伏尔这一概念的提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土壤,其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然而,列斐伏尔的写作风格松散跳跃,常常给读者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一文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内容艰涩,所论广泛,其主旨并不限于讨论作为艺术风格的“浪漫主义”。按照列斐伏尔的批判理路,这种艺术风格与“日常生活哲学”密切相关,因而也可以视其为一种生活风格。换言之,《向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编号21&ZD06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又译作“勒菲弗尔”“勒菲弗”等。

② 该文最早的中译本收录于柳鸣九主编的《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作家出版社,1965年。

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既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哲学”的一部分，也是他所讨论的美学实践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作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哲学”之认识论方法的补充。该文的英译者格林东（G. Grindon）结合学术史的发展指出，“这一宣言具有重要意义，其核心观点对居伊·德波和后继的国际情景主义造成了深刻的影响”（Lefebvre, 2012, p. 288）。这里所说的“核心观点”，正是指支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日常生活哲学”。

因此，在对“革命浪漫主义”这一概念展开具体辨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哲学”进行一番梳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家，列斐伏尔的一大贡献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引入了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关注，借助对“异化”理论的重新阐释，提出了以“日常生活批判”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哲学”。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旨在反思和批判战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特质，力图使人们摆脱被异化挟持的日常生活，实现主体性的解放。其“日常生活批判”的核心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来看，“日常生活批判”是对传统理论框架的突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通常不会将“日常生活”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因其在一般的理论表述中往往意指模糊。作为模糊的“整体”，“日常生活”意味着未经反思和质疑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列斐伏尔展开了一系列论证，通过提出“消费”“符号”“时间”“空间”等新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内部的各种新要素以及相关概念，拓展了战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野。其二，“日常生活批判”在列斐伏尔的哲学体系中起着枢纽作用。这种批判上承列斐伏尔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推进以及对现代性社会批判思潮的拓展，下启列斐伏尔后期提出的关于“城市”“空间”“节奏（时间）”等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正是对“日常生活”进行细致入微剖析后的产物。

由此可见，“革命浪漫主义”概念诞生于列斐伏尔以“日常生活批判”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哲学”，其实质是借助美学方法来批判日常生活，尤其是批判资本主义操控下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革命浪漫主义”和“审美现代性批判”具有某种相似性。^①“审美现代性批判”是由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概念与方法。它既对美学和艺术异化现象进行反思，同时也关注到艺术作为反抗手段的可能性。就“革命浪漫主义”这一概念而言，其意涵具有三个明确的递进层次，分别是作为基础的浪漫主义传统，“革命”与“浪漫”的结合，及其在日常生活批判中的地位和作用。

^① 列斐伏尔曾对卢卡奇的理论给予专门讨论。这种观念之间的影响不应被忽视，尤其是两者都对“异化”理论有所发展和改造。

一 对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和批判

按照列斐伏尔在《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一文中的说法，传统浪漫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之间的主要差别可概括为如下几个要点。（参见 Lefebvre, 1957, pp. 662 - 669）

第一，浪漫化的“拜物”与批判意识的差异。传统浪漫主义着眼于“过去”，其批判性受到“过去”的束缚，将对“物”的崇拜和异化作为真理的标准，充满狂想和谵妄。革命浪漫主义则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要求时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同时又具备想象和造梦的能力，以批判性的“浪漫”发掘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解决个体异化之方案的差异。传统浪漫主义觉察到作为个体的人的内在异化，“自我”与世界（“非我”）的对立，但选择了消极避世，诉诸虚无而非真实，即在精神上对抗异化，在肉体上却屈服于异化。革命浪漫主义则拒斥传统浪漫主义的消极态度，认为消除异化首先应当辨别生活中的异化现象，理解造成人性内在冲突的原因，以健全的人本主义去调和浪漫主义的反叛，从而缔造革命的“可能性”。传统浪漫主义反对权力，反对普遍价值，但最终构建起的是一种私密的个人世界。革命浪漫主义则从“对人之存在的可能性的剥夺”这一角度反对异化，同时以激烈的、实践的姿态面对现实，在现实的诸种矛盾中深挖“可能性”。

第三，艺术创作和批评的不同走向。传统浪漫主义混合各种流派和类型（如散文与诗的结合）进行艺术创作，由此产生了表达模式和情感状态的“模糊性”。革命浪漫主义出于对现实语境的时刻关注，确保了“整体性”，同时又不放弃产生超越意义的可能性。

第四，对待现实矛盾之态度的差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现实世界当中最基本的两组矛盾。但在传统浪漫主义者眼中，这两组矛盾已激化为绝对的二元对立。革命浪漫主义则得益于辩证法的引入，发展出与传统浪漫主义不同的视野，认为虽然矛盾的事实并没有消失，但对立双方留下了相互联系的“可能性”。

以上四个方面是列斐伏尔在《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一文中对“革命浪漫主义”与传统浪漫主义作出的主要区分。不难看出，这两者虽有相似性，但其差异更为明显。由此可以看出，列斐伏尔提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是对传统浪漫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在扬弃了传统浪漫主义的部分陈旧观念的同时也保留了传统浪漫主义的部分底色。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法兰西漫长的浪漫主义传统，引领列斐伏尔走上了浪漫主义道路。自18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大本营之一。卢梭是公认的推动法国浪漫主义兴起的重要人物。施莱格尔（A. W. von Schlegel）和斯塔尔夫夫人（Madame de Staël）都曾指出，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经过修正的普罗旺斯游吟

诗人传统。帕里斯 (B. P. G. Paris) 也认为, 浪漫主义起源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而在欧洲浪漫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整个西欧以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为代表的国家对浪漫主义的交流、传播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雨果、波德莱尔、兰波等人与歌德、柯勒律治、拜伦之间的相互影响中窥见。由此可见, 法国始终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据地, 在这片土壤上生活的知识分子无不受其惠泽。这或许可以为列斐伏尔浪漫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提供一定的语境依据。

相较于传统浪漫主义, 列斐伏尔的“革命浪漫主义”呈现出的异质性是法国浪漫主义独有的“异见”传统之延续。这种“异见”既包括对外的反抗, 也包含内部的激烈交锋。(参见 Jones, p. 294) 同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运动一样, 法国浪漫派也反抗制度和普遍性, 比如从不同渠道搜罗某些被官方忽视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品味大多不被官方认可, 具有世俗化的特质, 或来自陌生的异域——以尝试不断质疑、补充、更新过去延续下来的艺术资源。(参见 Hartman, p. 244) 以赛亚·伯林在其代表作《浪漫主义的根源》中将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征概括为两点, 即“自由无羁的意志及其否认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 以及“试图破除事物具有稳固结构这一观念”。(参见伯林, 第 155 页) 具体而言, 伯林将浪漫主义视作对“知识即美德”这一古老传统的批判。在这一传统中, 只存在着人们必须服从的种种事实, 和发端于古代并不断固化的唯理主义, 充满理想的与互容性的普遍原则和标准。这些特征最终指向的是某些不得不服从的“权力意志”: 来自自然、权威知识分子和国家。这一固化的传统正是将列斐伏尔引向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动因。在《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一文发表的 1957 年,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哲学”已初具规模。这种哲学致力于批判消费体制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和侵蚀, 批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专家技术体制及其符号体系制造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虚假幻象。在这个方面, 列斐伏尔与旧浪漫主义达成了在不同语境下的共识, 即坚持浪漫主义的初衷, 反叛现存的制度。

除此之外, 法国浪漫主义之“异见”传统最显著的特点是, 从其内部“无法形成一种能够满足一代以上追随者的模式”(Jones, p. 295)。这就意味着建基于反思和批判之上的浪漫派相关理论快速更迭反而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爬梳这一时期法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法国浪漫派内部激烈的交锋, 在此基础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国浪漫主义自身发展的矛盾和反复。卢梭提出的“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为法国浪漫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而拉马丁和缪塞却更多地强调个体情感与精神, 忽视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这种“个人主义可以成为无数主观幻想的肥沃土壤, 却无法提供足够坚实的东西来构筑客观的艺术”(同上, p. 295)。波德莱尔反对拉马丁和缪塞, 认为他们作为艺术家缺乏意志力, 不能充分驾驭自己的灵感。(参见同上, p. 298) 持相似立场的戈蒂耶, 其成就证明了他是浪漫主义绘画的辉煌一隅, 而他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却让从雨果到维

尔哈伦的浪漫主义者都感到厌恶。即便是崇拜戈蒂耶的波德莱尔也曾尖锐地指出：“混淆激情与理性就是扼杀文学。否定以往社会的努力，不论是基督教的还是哲学的，都是自杀；都是否定完美的力量和手段。将自己完全包围在物质艺术的诱惑之中，就是在制造灭亡的巨大机会。”（Baudelaire, p. 306）为了遏制主观性的滥觞，勒孔特·德利尔（Leconte de Lisle）转向了一种近乎古典的清醒和矜持，但仅仅过了两代人的时间，他提出的艺术观点和标准就已被抛弃。（参见 Jones, p. 297）在列斐伏尔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反思、批判和扬弃传统的延续。他遵循“异见”传统，指出了传统浪漫主义模式的不足，由此提出的“革命浪漫主义”较之传统更贴合当时的语境。

列斐伏尔提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最终体现了传统浪漫主义理性和反思的特质。从上文的简述可以看到，法国浪漫主义在其发展和鼎盛时期都表现出一种不稳定感。（参见同上，p. 299）这种不稳定感表现为其理论的转瞬即逝和其立场的摇摆不定。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国浪漫派始终都在主观性与社会性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摇摆在早期尤为明显。直到雨果的时代，法国浪漫派才意识到艺术的力量能够将主观性与社会性结合在一起，从而走得更远。雨果强调 17 世纪艺术的重要地位，认为通过对 17 世纪艺术的再发掘，可以充实法国文化的遗产，恢复或创造各种新艺术形式，让“我”成为“他者”，并将个体提升到更加全面的境界。（参见 Hartman, p. 243）在雨果之后，从兰波到波德莱尔的浪漫主义者始终珍视艺术的力量，认为它能将思想转化为情感，或者将自我意识转化为有机的、共同的愿景。（参见同上，p. 243）在其中，可以看到社会性与主观性的交融互通。波德莱尔对这种艺术力量和艺术追求曾给予如下精炼概括：“就是要创造一种暗示性的魔力，既包含客体，也包含主体，既包含艺术家之外的世界，也包含艺术家本身。”（Baudelaire, p. 128）由此可知，在法国浪漫主义后期，艺术家和理论家们较为完满地完成了对浪漫主义实质的界定：主观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理性、反思与感性、抒情融会贯通。列斐伏尔的“革命浪漫主义”充分体现了这一实质，尤其是在对想象力的看法上，列斐伏尔与波德莱尔的观点如出一辙。后者认为，想象力是一种超越感受力和幻想的能力，是一种能够“觉察出事物之间内在的、隐秘的关系，应和的关系，相似的关系”（同上，p. 329）的能力。在列斐伏尔和波德莱尔的观念里，想象力并非一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直觉能力，亦非单纯的幻想或空想——真正的想象力当中必定包含着批评的精神。（参见刘波，第 17 页）这或许可以解释“革命浪漫主义”肯定和借用神话、图像、梦境等浪漫主义传统艺术表达方法的原因。列斐伏尔通过对这些方法的借用以及对其可能性的进一步挖掘，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独有的讽刺手段。相较于现实主义的白描，这种讽刺手段更能透过现实表象抵达理解的深处，从而摆脱表象的约束，达到辩证的否定。（参见 Lefebvre, 1957, p. 667）

列斐伏尔的这一理论创新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它表明了列斐伏尔舍弃现实主义、选择浪漫主义的理由，因为现实主义所描摹的是现实的表面，停留于忠实的模仿，没有分析的介入。（参见同上，pp. 651 - 652）其二，传统的浪漫主义并未过时，浪漫主义方法仍然可以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挥作用。其三，革命浪漫主义表现出的进步性在于以分析和批判的态度直面现实，而这是怀旧的、消极的传统浪漫主义所不具备的。概括地说，“革命浪漫主义”所走的依然是法国传统浪漫主义坚持的路径，即主观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但在列斐伏尔身上，这两者在得到较之以往更加全面和深刻关注的同时，也较为完满地有机结合在一起，体现了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由此可知，列斐伏尔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一种对传统有所扬弃的美学理论，但其浪漫主义的底色并未发生改变。一方面，革命浪漫主义在目的和方法方面承继了传统。另一方面，与传统浪漫主义一样，主观性与社会性贯穿于革命浪漫主义始终，既要求传达个体的情绪和精神世界，也要求表达对专制的反思和不满。这两种浪漫主义都试图以一种美学模式来表达、阐释和批判现实生活。从实质上看，革命浪漫主义与传统浪漫主义的差别在于是否坚持二元对立。正如历史所呈现的那样，在主观性与社会性之间，传统浪漫主义总是在摇摆不定中滑向某一方，从而加深了对象间的对立，形成偏颇和片面的艺术理论。革命浪漫主义则发现了沉积在日常生活中的断裂与对立，同时也把握到模糊表象背后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意味着联系，直接表现为对立双方之间保留着“可能性”的空间。通过引入辩证法，列斐伏尔得以在传统浪漫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革命浪漫主义”，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次，成功地将其与“日常生活哲学”结合在一起。

二 迈向“可能性”的“革命”

从上文可以发现，深嵌于整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中的反抗传统，意味着浪漫主义自身就具有某种革命性。因而，列斐伏尔的“革命浪漫主义”理论在继承传统浪漫主义底色的同时也继承了其革命性，同时又明确地将其与“日常生活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列斐伏尔将德国浪漫派与法国浪漫派进行了对比。他在两者看似相同的表征背后发现了它们迥然不同的思想渊源，从而揭示了后者所承继的法兰西革命传统。尽管德法两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外表上相似，如对现实的蔑视、对异国情调或幻想的沉溺、对青春和情欲的赞扬等，但德国浪漫主义对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特性和资产阶级特性始终怀着欲拒还迎的态度——始终在逃避。法国浪漫主义则产生于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浪漫主义出于对革命后产生的社会不满，出于深刻拒绝和要求超越的愿望，其美学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批判的使命。（参见同上，pp. 653 -

655) 列斐伏尔揭示的这一差异或许更多源于对法国大革命这一重大事件的强调, 因为同时期的德国并没有出现如此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但事实上, 德国浪漫主义美学同样具有批判性, 尤其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相关论述。

不过,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列斐伏尔对法国大革命的重视。革命的伟大宏愿的提出与破灭、随后的复辟和血腥镇压以及 19 世纪早期进一步革命的历史余波, 都深刻影响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和文化, 这些影响尤其体现在思想和话语表达方面。(参见 Abrams, p. 20) “主观性”和“逃避现实”是人们对浪漫主义的一般认知,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则会发现, 从布莱克、华兹华斯到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皆对当时社会进行过研究和批判。那时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情感、思想和作品主题上的转变与创新皆得益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但是, 这种“文学中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骚动和论争, 以及它所带来的希望和恐惧。一言以蔽之, 浪漫主义是“对大革命开创的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反动”, 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参见同上, pp. 21 - 22) 浪漫主义的革命性是在历史演进中发展起来的, 它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直接表现为主题、手法的突破与创新, 形成了与前代迥然不同的风格。究其本质, 不仅是对资本和专制的反思与批判, 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与革新方法。

列斐伏尔继承了贯穿法国大革命始终的人本主义世俗理想与反对专制主义政权压迫的革命目的。不过, 列斐伏尔在此呼唤的革命已经和传统有所不同。一方面, 就革命的手段而言, 或许出于对中后期“已从自由和平等的宣言转变为流血和无政府状态”的法国大革命(参见 Saul, p. 6)的反思, 列斐伏尔时期的革命已然放弃了暴力手段, 转而通过寻求生活、写作和艺术中的自由表达, 以实现人类超越肉体 and 自然存在的目标。另一方面, 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群众运动, 退居学院, 关注点从政治和经济转向了文化和艺术。这就是说, 虽然其革命的根本对象仍然是资本主义, 但就其直接对象而言——正如“革命浪漫主义”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暂时放弃了对基础的攻坚, 转而选择从上层建筑发起革命。^①

由此可见, 列斐伏尔选择将“日常生活”作为批判和革命的主要对象, 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起日常生活哲学, 这就为“革命浪漫主义”提供了新的革命性。“革命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是列斐伏尔在撰写和出版《日常生活批判》第 1 卷(1947 年)、《日常生活批判》第 2 卷(1961 年)以及《现代性导论》(1962 年)等著作期间提出的。我们从上述著述中可以发现, 这个时期的列斐伏尔敏锐地觉察到了传统意义上宏大的、整体式的“总体性革命”日渐式微。出于对斯大林主义失败的反思, 同时面临现代性语境中矛盾与断裂汇集的消费主义, 以及战后社会主义和共

^①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脉络, 佩里·安德森(P. Anderson)曾作过较为详细的梳理。(参见安德森, 第 36、59—62、73、96—100 页)

产主义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列斐伏尔依然坚持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革命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意义。他指出，面对“现代性情境”，“革命”的可能性需要在日常生活的艺术化瞬间实现。所以，革命浪漫主义的“革命”意味着“在紧张和等待的过程中，对现存事物开展的持续、平静的挑战”（Lefebvre, 1975, p. 671），而其对象正是日常生活。《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是列斐伏尔从美学领域发起的革命运动宣言，吹响了对日常生活进行“革命”的号角。不久之后，在其理论成熟期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1968年）及《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1981年）中，列斐伏尔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身体”“空间”“节日（时间）”三个方面的具体革命设想。因而可以说，革命浪漫主义的开创性意义既反映在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思想和美学理论中，同时也是列斐伏尔理论发展的重要路径。

相较于从传统浪漫主义当中延续下来的革命性，“日常生活哲学”所提供的革命性的新颖之处在于对“可能性”的强调。就日常生活的特征而言，既具有辩证性，亦具有模糊性。一方面，它是一个日益被商品殖民化的领域，充满着各种神秘化、拜物教和异化，因而“最非凡的事物通常也是最日常的事物”（Lefebvre, 1973, p. 647）。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是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的原始舞台，“是实现可能性的必然起点”（Lefebvre, 2017, p. 14），“最高法院、智慧、知识和权力要在这里接受审判”（Lefebvre, 1958, p. 6），没有人能超越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实际上内化了全球资本主义——没有各种日常生活，没有现实时空中真实的人的生活，全球资本主义就什么都不是。（参见 Merrifield, pp. 10 - 11）所以，批判资本主义就要批判日常生活，就要从模糊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可能性，从而发起革命。

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可能性”需要借助辩证法。^①列斐伏尔所运用的可能性的辩证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在其基础之上作了进一步发展。他曾在批评萨特时强调了马克思的历史分析的价值，将其概括为一种持续回溯与前进的模式，即不断在过去与当下之间交替，对现在的可能性条件进行回溯性、历史性分析，用现在来理解过去，用过去来理解现在。（参见 Elden, p. 38）通过这一方式，我们就能够探索可能性，放眼未来。这种可能性既是对当下可能性条件的历史分析，也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分析，它为我们打开了通向未来和可能的大门。“今天的乌托邦就是明天的可能。”（Lefebvre, 1978, p. 200）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种客观的相对主义，或者说是一种不排除某种相对性的更深层次的客观性理论：过去之所以成为现在，是因为过去客观地隐含着各种可能性。（参见 Elden, p. 181）列斐伏尔有关《尤利西斯》的批评实践可被看作对该理论相对具体的解释。他指出，

^① 列斐伏尔所运用的可能性的辩证法虽然与马克思提出的辩证法有着深刻联系，但仍有较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前者融入了黑格尔和尼采的思想。因此，为了有所区分，后文均采用“可能性的辩证法”一词。

这部作品“证明了一部伟大的小说也可以是无聊的。而且是‘深刻的无聊’。然而，乔伊斯明白一件事：对一个普通人一天生活的报道必须以史诗模式为主”（Lefebvre, 1980, p. 348）。这种普通人与“全人类”之间的联系即当下与可能之间的联系。前者孕育着后者，后者已经存在于前者之中，处于潜在的胚胎状态，在孕育中等待着伟大的、划时代的想象力的飞跃。

列斐伏尔在《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中提出，“可能性的辩证法”意在将艺术和生活的问题性推向极限，再借助传统浪漫主义的常用手段，因而能够发掘出不同层面的“精神性缺失”，“可能性”也就随之产生。（参见 Lefebvre, 1957, p. 662）他以“沟通”为例解释道，“无法沟通”带来的压抑感不单单预示着“沟通”的缺失，更暗示着完美的、超越先前“沟通”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一种较之过去更有力量、更深沉的沟通”的可能性，“无法沟通”的压抑感也就随之产生。（参见同上，p. 662）列斐伏尔认为，这或许还可以解释“青年病”的产生。简单地说，“青年病”指因察觉到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却难以将之转化为现实，从而产生的个体精神危机和存在危机。

列斐伏尔对革命浪漫主义的“可能性”作出如下界定：“革命浪漫主义”的可能性指的是“不可能的可能性”，而“可能的可能性”与“不可能的可能性”是一对辩证概念。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也对当时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他认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希望通过意识形态手段来构建新的个体性，并由此构成一种理论样态之下的总体性；然而，重要的不是意识形态或理论上的总体性，而是具体的总体性；这就意味着不需要预设某种可能性再开拓构建的路径，而是直接否定既成的现实，尝试重建不同类型的意识与个体的总体性。（参见同上，p. 662）因此，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是一种“可能的可能性”。

为了区分“可能的可能性”与“不可能的可能性”，《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具体实例。比如，在文中“可能的可能性”的部分，列斐伏尔列举了“安居乐业（今天法国的资产阶级）”“找到一份工作、公寓（尽管不太容易）”“作家将语言置于所有之上”“重视技术”“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以及掩盖问题的伪解决方案）”“愤世嫉俗与在挑战（现存事物）方面虚晃一枪（有时将其作为自身的事业）”等生活现实。（参见同上，pp. 669 - 670）这里的大多数例子呈现出的倾向是顺应现存事物和制度造成的可能性，相伴而生的是“解决问题”和“愤世嫉俗”等佯装反抗之姿，实质却是另一种甘于顺从之态。可见，“可能的可能性”可被看作顺应现实而对诸种必将实现的现实的希望和规划，但其最终实现只会让日常生活中的断裂和矛盾变得愈加深刻。

有鉴于此，列斐伏尔所规划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包含四种情况，分别是“普通人在技术、国家和财富领域的力量积蓄中有所参与”；“以合适的语言实现私

主义社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物质生活的贫困。但他同时尖锐地指出，“新的贫困”不可避免。这种贫困指向的不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无法满足，而是面对规模化工业生产制造的消费主义幻象，个体的需求并未得到真正的满足，反而被操控、剥削，被虚假的欲望所占据。（参见同上，p. 80）列斐伏尔还认为，新资本主义同时代表着一个技术统治原则无孔不入的社会。这意味着在新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不再是目的，而是更多地被当作手段来管理和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对消费（将商品变为图像、将人的需要拆解并重塑为“欲望”）、符号（语言由“复调”转向“单调”、娱乐和广告工业所导致的符号泛滥）、时间（过去以自然规律为核心的时间循环被消解，新的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建立起来；个人生活时间碎片化；劳动时间不断挤压休闲时间）、空间（对城市空间的区分和规划）等日常生活领域的控制，新资本主义建立起了一个“单向度的”“规训的”“恐怖主义的”社会。（参见刘怀玉，2007年，第13页）由此造成的诸种矛盾、对立、断裂汇集于日常生活，使得日常生活成为“幻觉与真理、权力与无助的交集；人控制的部门与他无法控制的部门的交集”（Lefebvre, 1958, p. 29）。消费和符号等领域的异化最终导致主体的异化，进而导致精神上的缺失感，而这是所有个体都无法逃脱的。

针对上述矛盾和困境，列斐伏尔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改变日常生活，资本主义将继续降低日常生活质量，并抑制真正的自我表达。（参见 Elden, pp. 110 - 126）这就需要借助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又缺乏批判新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列斐伏尔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异化”出发，提出了一套分析日常生活、发现“可能性”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起点是日常生活批判，针对的是“一种复杂的多面孔的现实，是压迫的与解放的品质的混合物，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区分和辩证分析，这就是要把那些需要与满足的、有价值的、新的生命力的肯定的内容从否定的异化的因素中拯救和提炼出来”（Gardiner, p. 86）。借助“可能性的辩证法”，在处理复杂多变的日常生活问题域时，列斐伏尔成功地在诸种矛盾和断裂中发现了“空白”，发掘出了藏匿在现存事物之下的“可能性”。“可能性”意味着“希望”，要想将其转换为现实就必须革命。不过，过去那种暴力的、激烈的武装方式并不可取。对列斐伏尔来说，合理的是“主要用尼采的方法来改变世界，把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理想从政治变革变成一种艺术创造”（刘怀玉，2018年，第53页）。在这种社会批判的总体要求下，“革命浪漫主义”成了一种具备社会革命性的美学观念。

根据以上对“革命浪漫主义”社会批判基础的梳理并结合前文分析，至此我们已能够形成某种关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较为完整的认识。列斐伏尔提出的“革命浪漫主义”立足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扬弃了法兰西浪漫主义传统，针对普遍异化的现代性语境，借助辩证法分析、挖掘日常生活中的可能性，通过批判日常生活来达到对新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为了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消除主体异化，解放被压迫的人类精神，列斐伏尔主张审慎地看待暴力革命，将“革命”转化为一种艺术创造。由此出发，革命浪漫主义力图使自身自发地嵌合进日常生活领域，呼应“让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品”的理念，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学模式。简言之，我们可以将“革命浪漫主义”看作“日常生活哲学”在美学领域的实践，亦可以认为“革命浪漫主义”是列斐伏尔推进“日常生活哲学”的美学路径。

此外，格林东为“革命浪漫主义”给出的中肯界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他认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提出旨在为西方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提供一种适当的美学，它从对日常生活中主体异化的评估出发，强调对未来与“可能性”的重视。为了规避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标签，列斐伏尔提出的这一主张涉及主体性超越的理论，他扬弃了被传统浪漫主义视为珍宝的“过去”，毅然决然地拥抱“当下”和“未来”。因此，严格说来，列斐伏尔的“革命浪漫主义”应该被视作唯物主义的新形式，是激进理论的抒情化、诗意化运用，同时又直截了当地回应了情景主义“实事求是，要求不可能”的号召。

结 语

作为批判新资本主义方法的“革命浪漫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就其表现出的进步性而言，“革命浪漫主义”坚持改造现实、解放大众的革命信念，同时又吸取斯大林主义和暴力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非暴力的、美学的、符合当下语境的革命路径。它深刻意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亟待新的阐释，力图通过“异化”问题找到批判新资本主义的新方法。它对传统浪漫主义给予一定的扬弃，拒绝消极避世与沉溺幻想，拒绝把“过去”神圣化，而将浪漫主义的核心手段——象征和想象用在现存事物的调查、分析和阐释中，着眼于当下与未来的可能性。就其表现出的批判性而言，“革命浪漫主义”承认日常生活中现存事物的现实性，质疑其真实性，对国家机器麾下的制度、一切为资本积累服务的权力机构、技术等发起抨击，力图揭穿新资本主义在消费、符号、时间、空间等日常生活领域制造的幻象，消除诸种异化，解放被压抑和被操控的人民。就其在列斐伏尔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而言，如前文所述，“革命浪漫主义”与“日常生活哲学”遥相呼应，完满地表现出列斐伏尔自身理论的逻辑自洽。从列斐伏尔长达数十载的学术生涯来看，“革命浪漫主义”不仅吹响了列斐伏尔在美学领域的革命号角，也是他整个日常生活革命行动的开端。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列斐伏尔相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提出了具体的革命行动纲领，大致可以概括为“技术应为日常生活服务”“废除国家和实行自治”，以及“让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品”。其中，文化领域的革命行动纲领亦可被视作列斐伏尔在《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一文中提出的“艺术风格成为生活风格”的回响。

综上所述,对“革命浪漫主义”这一颇具始源性的概念展开研究,既能对列斐伏尔思想研究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亦能加深我们对新资本主义批判之路径和手段的认知。

参考文献

- 安德森,1981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
- 伯林,2019年:《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张箭飞译,译林出版社。
- 刘波,2003年:《波德莱尔与法国浪漫主义思潮》,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5期。
- 刘怀玉,2007年:《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恐怖主义批判》,载《求是学刊》第3期。
- 2018年:《理解列斐伏尔:以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的“三位一体”为主线》,载《山东社会科学》第5期。
- Abrams, M. H., 1992,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1790 – 1990”, in *The Bucknell Review* 1 (36).
- Baudelaire, C., 2020, *Oeuvres complètes de Charles Baudelaire: L'art romantique*, L. A.: HardPress.
- Elden, S., 2004,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 Gardiner, M. E., 2000,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Hartman, G., 1970, “Reflections on Romanticism in France”, in *Studies in Romanticism* 9 (4).
- Jones, P. M., 1929, “French Romanticism: A Tradition of Dissent”, in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4 (3).
- Lefebvre, H., 1957, “Ver un Romantisme Révolutionnaire”, in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5.
- 1958,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 Introduction*, Paris: L'Arche.
- 1973, *La Somme et le Reste Tome II*, Genève: Béliaste Éditeur.
- 1978, *La révolution n'est plus ce qu'elle était*, Paris: Hallier.
- 1980,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 II. Fondements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é*, Paris: L'Arche.
- 2012,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G. Grindon (trans.), in *Art in Translation* 4.
- 2017,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R. Sacha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Merrifield, A., 2006, *Henri Lefebv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Saul, N. (ed.), 2009,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rman Romantici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孙婧一